

俄國託爾斯泰著 上册

蛾眉之雄

拜經室刊

小說彙刊
第一種

社會小說

心獄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袖珍小說
銀鈕碑

上海商務印書館

清末民初

小说版本经眼录

(俄国小说卷)

付建舟 ● 著

中國致公出版社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成果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成果

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

(俄国小说卷)

付建舟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 俄国小说卷 / 付建舟著.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145-0815-4

I. ①清… II. ①付… III. ①小说—版本—介绍—世界—近代②小说史—史料—世界—近代 IV. ①G256.23
②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4709 号

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俄国小说卷

付建舟 著

责任编辑: 董拯民

责任印制: 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东区 15 层

邮 编: 100025

电 话: 010-82259658(总编室) 62082811(编辑部)
010-66168543(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7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清末民初俄国小说译介路径综考(代前言)^①

付建舟

也许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及其五四文学本位观的影响,学界对清末民初汉译俄国小说一直存在一种偏见,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漠视与对五四以后的汉译苏俄小说的高度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学界对前者的研究不仅考证很不充分,而且评价也明显偏低。一些涉及这一论题的论文和论著或论著中的相关章节,多半相互转用已有的资料,新发掘的材料比较欠缺。不少论述大多建立在工具书“篇目”索引的基础上,未能全面查阅原刊原文,有时以讹传讹。因此,该论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笔者不揣浅陋,根据自己多年的累积,以经眼译作为主,辅以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与工具书,试图揭示清末民初俄国小说汉译的面貌,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日译本译介路径的俄国小说考述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清末民初一些俄国小说汉译本是经过日译本转译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甲午战败,中国取道日本学习西方,成为大势所趋。日本是我国西学东渐的一道重要桥梁,通过日译本转译,成为俄国小说汉译的一条重要路径。

^①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说部丛书》研究”(09YJC751079)的部分成果。

(本文原载日本《清末小説から(通訊)》no. 115/2014. 10. 1 与日本《清末小説から(通訊)》no. 116/2015. 1. 1)

有些译作的序跋、小引、原著者或译者自注、版权页等文本之外的副文本,为我们辨别汉译本所据底本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例如《俄国情史》、《枕戈记》、《忧患余生》等作品,我们根据副文本可知,这三部译作都是根据日文转译的。其篇目如下:

1903 《俄国情史》(今译为《上尉的女儿》),普希馨(普希金)原著,戢翼翬译,上海大宣书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十五日出版。

1905 《枕戈记》,托尔斯泰原著,未署汉译者,《教育世界》第100、102、111号(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下旬、五月下旬、十月上旬)。

1907 《忧患余生》(今译为《该隐与阿尔乔姆》),戈厉机(高尔基)原著,吴棹译,《东方杂志》第4卷第1—4期(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

《俄国情史》的版权页明确地署曰“译述者 日本高须治助”,“重述者 房州戢翼翬”。正文前还署“《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译者高须治助又为高须治辅笔名墨浦、五湖散人,精通俄语。1883年,他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译成日文题名《俄国奇闻 花心蝶思录》。高须治助的日译本是根据俄文原著翻译的。《俄国情史》以此书为蓝本,但忠实于日译本,高须治助的白话日译本约八万七千字,而戢翼翬的文言汉译本仅二万七千字,不足白话译本的三分之一。^①《枕戈记》卷首的一段话提供了诸多有益信息,这段话说道:“《枕戈记》为俄国现代文豪脱尔斯泰所著。假一军人口吻,述俄营情状也。日本二叶亭译之。江苏师范学堂取作习和文课本。本社据其译稿润色之。”^②又据日本樽本照雄编

① 参见张铁夫:《普希金初临中土的向导——戢翼翬与普希金》,《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

② 见《枕戈记》卷首,托尔斯泰原著,未署汉译者,《教育世界》1905年5月第100号。

《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6版)(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2014年)(以下简称“樽目录”),《枕戈记》又译为《林木伐採》,原著初版于1855年,二叶亭(四迷)译成日文,1904年7月由日本金港堂出版,题“军事小说”。二者是吻合的。《忧患余生》原刊署“日本长谷川二叶亭译”,“钱唐吴棹重演”,“原名《犹太人之浮生》”,题“种族小说”。又据“樽目录”,二叶亭日译为《犹太人の浮世》,刊载《太阳》杂志第11卷第2、4号(1905年2月1日—3月1日)。二者也是吻合的。

有些译作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研究,确认或猜测其汉译时所据底本。我们重点考察以下作品(笔者未见者随后注明):

1907 《银钮碑》(即《当代英雄》第一部分《贝拉》),俄国莱门忒甫(莱蒙托夫)原著,吴棹译述,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版,“袖珍小说”丛书之一。

1907 《黑衣教士》(今译为《黑修士》),俄国溪崖霍夫(契诃夫)原著,吴棹译。《袖珍小说》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初版,中华民国三年(1914)三版。

1908 《鹰歌》,俄国郭尔奇(高尔基)原著,天蛻译,《粤西》(东京)第4号(1908年5月29日)。(未见)

1909 《俄帝彼得》,俄国蒲轩根(普希金)原著,冷(陈景韩)译,《小说时报》第1年第1期(宣统元年九月朔日即1909年10月14日)。

1909 《生计》,俄国屈华夫(契诃夫)原著,冷(陈景韩)译,《小说时报》第1年第2期(宣统元年十月朔日即1909年11月13日)。

1909 《写真贴》,俄国祁赫夫(契诃夫)原著,笑(包天笑)译,《小说时报》第1年第2期(宣统元年十月朔日即1909年11月13日)。

据“樽目录”可知,《银钮碑》LERMONTOV 著《现代の英雄》(《ペーラ》部分),1840 出版,有日译本,嵯峨家主人所译,易原名

《当代の人物》为《当代の露西亚人》，刊载《太阳》杂志第10卷第5号(1904年4月1日)。《黑衣教士》也有日译本，为薄田斩云所译，译名为《黑衣僧》，刊载《太阳》杂志第10卷第13—14号(1904年10月1日—11月1日)。1904年，《大陆报》第2年第12号(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刊登了《东京留学生天君蛻与本馆记者书》一文，由此可知天蛻为留日学生，则《鹰歌》可能以日译本为底本。据李艳丽考证，《鹰歌》由日本上田敏1902年日译为《鹰之歌》，天蛻的底本很可能就是《鹰之歌》。另外，李艳丽还考证说，《俄帝彼得》日译为《彼得大帝的黑奴》，日译者不详；《写真贴》由日本濑沼夏叶1903年日译为《相册》，刊载于明治36年10月的《新小说》杂志上^①。她没有明说这几篇汉译作品以相应的日译本为底本，但有这样的暗示，我们权且遵循其暗示。《生计》为陈景韩所译，陈曾留日，权且认为他以日译本为底本。

以日译本为底本的译者，一般有留日经历，或偶尔客串，翻译小说，如戢翼翬；或一个时段集中从事小说翻译，如吴棹、陈景韩；另外一些译者出于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与爱好，自学日语，借助工具书翻译，如包天笑。他们三人是以日译本为底本译介俄国小说的杰出代表，具有典型性。上述日译本的译介主体包括高须治助、二叶亭(四迷)、升曙梦、嵯峨家主人、薄田斩云、上田敏、濑沼夏叶，当然还有不少其他日本翻译家的俄国小说日译本没有进入我国译者的视野。

二、英译本译介路径的俄国小说考述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许多俄国小说汉译本是经过英译本转译的。最初的译者是在华传教士，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有的传教士还有华人合译者，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及其合译者任廷旭、

^① 李艳丽：《晚清俄国小说译介路径及底本考——兼析“虚无党小说”》，《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第212—213页。

德国传教士叶道胜及其合译者麦梅生等。这些传教士的英文水平很高,他们往往根据英译本把俄国小说(包括寓言、故事)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传播。他们试图借助于所译的寓言、故事表达一些哲理,为他们在华传播宗教服务。当然,这些译作对改良中国社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的译作如下:

1872 《俄人寓言》,未署原著者,美国丁魁良译,《中西闻见录》第1号(1872年8月即同治十一年七月)。

1899 《俄国政俗通考》,据印度广学会原本,美国林乐知与任廷旭合译,上海广学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版。原连载《万国公报》第131—136册(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即1899年12月至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即1900年5月)。(未见)

1907 《托氏宗教小说》,俄国托尔斯泰原著,德国叶道胜译,东官麦梅生述,香港礼贤会出版,光绪三十三年丁未,西历一千九百七年。

《俄人寓言》讲的是关于道义的故事,没有足够的依据证明其底本为英译本,但可能性很大。《俄国政俗通考》据戈宝权所言“从英文译出”^①,其中包括克雷洛夫的三则寓言。在《万国公报》上首载时,还有《俄国政俗通考(并序)》,连载的最后一期是《俄国政俗通考弁言》。《托氏宗教小说》也据戈宝权所言“根据英国尼斯比特·贝恩翻译的《托尔泰小说集》转译”^②。部分译作曾在上海《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上发表过。《托氏宗教小说》凡十二篇,包括《主奴论》、《论人需土几何》、《小鬼如何领功》、《爱在上帝亦在》、《以善胜恶论》、《火忽火胜论》、《二老者论》、《人所凭生论》、《论上

① 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② 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帝鉴观不爽》、《论蛋大之麦》、《三耆老论》、《善担保论》。叶道胜说,他汉译《托氏宗教小说》之宗旨在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欲华人知俄国亦有至善之著作家”。^①王炳堃在序言中也说:“泰西小说或喻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淪民智,故西学之士译泰西小说,不啻汗牛充栋。”^②他强调《托氏宗教小说》开启民智的启蒙作用。

除了几个传教士外,根据英译本汉译俄国小说的基本上是中国译者,如周作人、莫等闲斋主人、朱世溱、陈赅等。他们的译作如下:

1905 《一文钱》,俄国斯谛普哥克原著,三叶(周作人)译,《民报》1905年第21号。

1908 《奈何天》,俄亚历山大杜庐原著,莫等闲斋主人(陈尺山)译。上海改良小说社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月中旬出版,新世界小说社总发行。题“写情小说”。

1908 《庄中》(即《戚施》),署名“俄国安敦契诃夫著”、“独应译”,《河南》杂志第8期(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题“短篇小说”。

1909 《域外小说集》(周作人翻译的俄国小说部分),周氏兄弟译,1909年先后分两册在日本东京出版,1921年两册合订并增补21篇由上海群益书局出版。(前者未见)

1914 《骠骑父子》(今译为《两个骠骑兵》),俄国托尔斯泰原著,朱东润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说部丛书》四集系列第二集第八十一编,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九日初版,题“义侠小说”。

1915 《春潮》,俄国屠尔格涅甫(屠格涅夫)原著,陈赅节译,《青年杂志》第1卷第1—4号(1915年9月15日—12月15日)。

1916 《克利米战血录》,俄国托尔斯泰原著,朱世溱(朱东润)

① 叶道胜:《托氏宗教小说序》,《托氏宗教小说》,俄国托尔斯泰原著,德国叶道胜译,东官麦梅生述,香港礼贤会1907年版,第1页。

② 王炳堃:《托氏宗教小说·序》,《托氏宗教小说》,俄国托尔斯泰原著,德国叶道胜译,东官麦梅生述,香港礼贤会1907年版,第1页。

译,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5月初版,1930年11月再版。《小说汇刊》之一,题“军事小说”。

莫等闲斋主人,姓陈,原名韵琴,字尺山,号昊玉,长乐人,居福州。肄业于福建船政学堂,曾游学英伦,回国后居上海。除译作《奈何天》外,还著有传奇多种,包括《孟谐传奇》、《病玉缘传奇》等^①,《奈何天》的翻译可能以英译本为底本。周作人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五年,主要成绩是英文和汉文。五年后,他取得官费留日资格,居日前后达八年之久。他翻译域外文学作品主要以英文本为底本,翻译俄国小说也是如此。刊登于《民报》上的《一文钱》和刊登于《河南》杂志上的《庄中》都收入《域外小说集》中。《一文钱》的“译者附记”声称根据“其友人英国伏尼契 Ethel L. Voynich 氏译存之本”重述,因而汉译本可能以英译本为底本。群益书局1929版的《域外小说集》包括5位俄国作家的小说与寓言作品18篇,其中斯谛普虐克的小说有《一文钱》一篇,迦尔洵的小说有《邂逅》与《四日》二篇,契诃夫的小说有《戚施》与《塞外》二篇,安特来夫的小说有《谩》与《默》二篇,梭罗古勃的小说有《未生者之爱》一篇,寓言有《孱儿》、《冰糖》、《糖块》、《金柱》、《误会之起原》、《蛙》、《石子之经历》、《未来》、《路与光》、《烛》十篇。除了《四日》、《谩》与《默》三篇为周树人所译外,其余均为周作人所译。止庵认为,周作人的译作“据英文翻译或转译”^②,其根据可能源自周作人的《学俄文》一文。周氏曾回忆说,自己学习俄文半途而废,之所以学俄文,是因为佩服“它的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这一点一直没有变,“这计划便是用了英文与德文间接的去寻求,日本语原来更为方便。但在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亭和升曙梦两个人,偶然有译品在报刊发表。升曙梦的还算老实,二叶

① 参见官桂铨:《莫等闲斋主人考》,《文献》1983年第2期,第185页。

② 止庵:《总序》,《域外小说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页。

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①这是夫子自道,真实可信。由此推测,周作人的译本很可能是以英译本为底本,不排除参考日译本。这种翻译现象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然存在。1939年3月,由上海启明书局初版的俄国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也是这样翻译的。译者蓝文海在“小引”中明确地说:“本书是从汤姆斯·塞尔若(Thomas Seltzea)的英译本和参照米川正夫的日译本译出”^②。原因大概一样,可能英译本忠实于原著,日译本过于日本化,为了既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又能很好地汉译,他们相继采用这一策略。

朱东润的两部译作是留学英国时所译。1913年,朱东润通过留英俭学会赴伦敦,迫于生计而译书。他曾说:“我的英文程度本来很有限,到得英国可能有一些长进。翻译的问题是可大可小。……在经过一两次失败以后,我的译稿居然也能寄到上海换取外汇。”^③除了翻译文学作品外,他还翻译了一本《英国报业述略》,该译作在当时上海的《申报》上连载。《骠骑父子》与《克利米战血录》就是他这一时期的译作,其底本可能为英译本。《春潮》由陈赅所译。陈赅早年留学日本,自学英语,是《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的英文编辑,曾任教安徽大学日语教授。^④《春潮》正是他作《青年杂志》英文编辑时所译,并连载于该杂志上,因此可以推测其底本为英译本。

① 《周作人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203页。

② 《父与子》,俄国屠格涅夫原著,蓝文海译,上海:启明书局,1939年,第1页。

③ 《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4卷,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75—76页。

④ 叶永胜:《陈独秀文学革命的践行者:陈赅及其文学翻译》,《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在中国翻译史上创造了奇迹的林纾,本身不懂外文,却凭借深厚的古文功底与合作者共同翻译了一百多部域外小说,其译作成为“林译小说”品牌,在清末民初十分流行,经久不衰。其众多的合译者中没人懂俄文,其俄国小说汉译本一般根据英译本转译。马泰来认为,“林译各种托尔斯泰作品,当皆据英译本重译。唯所据英译本,无法考出。”^①今从其说。这些译作^②如下:

1914 《罗刹因果录》,俄国托尔斯泰原著,林纾、陈家麟合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一至六号连载(1914年7月至12月)。《说部丛书》四集系列二集第三十九编,封面题“笔记小说”,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四年(1915)五月初版,同年十月再版。

1917 《社会声影录》(收小说《尼里多福亲王重务农》与《刁冰伯爵》两篇),俄国托尔司泰原著,林纾、陈家麟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说部丛书》四集系列三集第二十二编,中华民国六年五月初版。

① 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钱钟书等著《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1页。

② 本文的“清末民初”主要指“1894—1919”这一时段,林纾与陈家麟1919以后合译的五部(篇)俄国小说备录于此,以供参阅。其篇目为:

1920 《球房纪事》,Lev Necolaevich Tolstoy(俄国托尔斯泰)原著,林纾、陈家麟同译,《小说月报》第11卷第3期(民国九年三月)。

1920 《乐师雅路白忒遗事》,俄国托尔斯泰原著,林纾、陈家麟同译,《小说月报》第11卷第4期(民国九年四月)。

1920 《高加索之囚》,俄国托尔斯泰原著,林纾、陈家麟同译,《小说月报》第11卷第5期(民国九年五月)。

1921 《俄宫秘史》,法国魁特转译德文,闽县林纾、静海陈家麟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说部丛书》四集系列第四集第一编,中华民国十年五月初版。

1924 《三种死法》,Tolstoy原著,林纾、陈家麟同译,《小说世界》第5卷第1期(民国十三年一月)。

1917 《路西恩》(Lucerne)(今译为《卢塞恩》),未署原著者,林纾、陈家麟译,《小说月报》第8卷第5号(民国六年五月)。(俄国托尔斯泰原著)

1917 《人鬼关头》(今译为《伊凡·伊里奇之死》),托尔斯泰原著,林纾、陈家麟译,《小说月报》第8卷第7—10号(民国六年七月至十月)。

1918 《恨缕情丝》(收小说《波子西佛杀妻》与《马莎自述生平》两篇),俄国托尔司泰原著,闽县林纾、静海陈家麟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小说月报》第九卷第一号至十一号(1918年1月至11月)连载。《说部丛书》四集系列第三集第六十二编,中华民国八年(1919)四月初版,中华民国九年(1920)十月再版,中华民国十年(1921)十月三版。

1918 《现身说法》(今译为《童年 少年 青年》),俄国托尔司泰原著,林纾、陈家麟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说部丛书》四集系列第三集第五十三编,中华民国七年(1918)十一月初版,中华民国九年(1920)八月再版,中华民国十年(1921)九月三版。

由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的《俄宫秘史》比较特殊,不得不提。马泰来在《林纾翻译作品全目》中把《俄宫秘史》列入法国魁特名下^①,彭建华在其论著《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中也是如此,^②可能因为《俄宫秘史》版权页署“原著者

法国魁特”的缘故。然而,他们均忽略了作品卷首“法国魁特转译德文”的字样,更忽略了卷首“小引”。出自法国魁特之手的“小引”说,此卷为斐多路纳之秘史,“记之者,丹考夫伯爵夫人也。……凡以下所叙述,均出诸丹考夫之口,语皆切实,……丹考

^① 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钱钟书等著《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1页。

^② 彭建华:《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夫草稿为德文,或意大利文,余则译以英文,语语皆肖,无复谬误。”^①由此可见,《俄宫秘史》由俄国丹考夫所撰,由魁特英译。林纾、陈家麟可能根据英译本汉译,这也为马泰来的“英译本”路径说提供佐证,尽管马泰来是就托尔斯泰的译作而言的,却可以扩展到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其他俄国小说。

另外两部可能以英译本为底本的译作如下:

1915 《雪花围》,俄国托尔斯泰原著,雪生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说部丛书》四集系列第二集第六十三编,中华民国四年(1915)十月一日初版。封面题“醒世小说”,短篇小说集。

1917 《婀娜小史》(今译为《安娜·卡列尼娜》),俄国托尔斯泰著,陈家麟、陈大镗合译,上海·中华书局,《小说汇刊》之13至16。1917年8月初版,1920年4月再版。

《雪花围》的译者雪生,其生平不详,待考。该译作据说“据英译本转译”^②。《婀娜小史》的主要译者是陈家麟。他与林纾合译的数部托尔斯泰小说均以英译本为底本,此译作可能也是如此。这两部译作均有待进一步考证。

《不测之威》有两种汉译本,其一如下:

1908 《不测之威》(今译为《谢历勃里尼亚尼公爵》),俄国托尔斯泰(即阿·托尔斯泰)原著,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说部丛书》四集系列第二集第九十五编,戊申年(1908)二月十八日初版,中华民国四年(1915)十月廿三日再版,题“历史小说”。

^① 《俄宫秘史》,林纾、陈家麟合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1年初版,第1—3页。

^② 见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关于《雪花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5初版本的编目信息。

这部译作很有代表性,其版权页不署具体译者,而署“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因为译者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职员,馆方提供了薪水,译作的版权属于馆方而不属于个人。那些署具体译者的译作属于馆方在一定时间内购买著作人的著作权,馆方只拥有暂时的版权。二者性质完全不同。该编译所的职员或曾自学外语(如英语、法语、日语等),或曾留学海外,具有较高的外文水平,能够独自或合作翻译外文书籍。根据当时外语学习的风气,该译作的底本能可能是英译本或日译本,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不测之威》的另一译本是周作人翻译的《劲草》,它几乎与《不测之威》同时译成,因重复而未被采用出版。1909年,周树人(即鲁迅)在为《劲草》所写的序言中,一方面强调了重译的合理性,“比附原著,绎辞抽意,与《不测之威》绝异”,“因念欧人慎重译事,往往一书有重译至数本者,即以我国论,《鲁滨孙漂流记》,《迦因小传》,亦两本并行,不相妨害。爰加厘订,使益近于信达。托氏撰述之真,得以表著;而译者求诚之志,或亦稍遂矣。”^①另一方面,澄清当时国人把阿·托尔斯泰(即亚历舍托·尔斯多)与列夫·托尔斯泰(勒夫·托尔斯多)混为一人的错误,指出二者为从兄弟关系。鉴于周作人的译作多以英译本为底本,权且认为《劲草》也如此。

以英译本为底本的译者一般具有良好的英文水平。有的具有新式学堂就学的经历,重视英语的学习,对文学很感兴趣,或偶尔为之,如朱世溱;或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如莫等闲斋主人;或日后以文学为业,如周作人;有的英文水平较高而汉文水平不足,常与他人合译,如陈家麟;有的供职于出版机构而不拥有著作权,如《不测之威》的汉译者。总之,情况各样,不一而足。

三、其他底本译介路径的俄国小说考述

除了以日译本、英译本为底本外,有的俄国小说汉译本还以德

^① 《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7页。

译本、法译本甚至俄文本为底本。清末民初,中国译者懂德语、法语、俄语的远远少于懂日语与英语的,因而这种译介路径的作品不多,但很有意义,它表明这一时期俄国小说汉译本译介路径的多样性。笔者所知的几部(篇)译作如下:

1909 《域外小说集》(周树人所译俄国小说部分),周氏兄弟译,1909年先后分两册在日本东京出版,1921年两册合订并增补21篇由上海群益书局出版。(前者未见)

1914 《心狱》(今译为《复活》),俄国托尔斯泰著,马君武译,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9月初版,1916年9月三版,《小说汇刊》之一。

1915 《绿城歌客》(今译为《卢塞恩》),俄国托尔斯泰著,马君武译,《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7、8期(1915年7月20日至8月20日)。

1918 《金台春梦录》,法国丹米安、俄国华伊尔原著,林纾、王庆通译述。《说部丛书》四集系列第三集五十编,中华民国七年(1918)八月初版,中华民国九年(1920)八月再版。

为数不多几位译家如周树人(鲁迅)、马君武、王庆通(合译者林纾)各具特色。周树人早就“弃医从文”,决定毕生以文学为业。马君武虽不以文学为业,却抱启蒙大志从事域外小说翻译。王庆通精通法文,汉文水平不足而与林纾合译。周树人曾自学德文,偶习俄文,其德文水平远高于俄文水平。《域外小说集》收入了他翻译了三篇作品,即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漫》与《默》。有人认为“鲁迅据德文转译”^①,权从其说。马君武曾留学日本、德国,精通英、日、德、法等国文字,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他翻译了不少外国著作,所用底本可能不限于一种文字。翻译域外

① 止庵:《总序》,《域外小说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页。

文学作品是他的业余爱好,其意不在消遣,而在于启发民众。在译诗《哀希腊》之首,马君武说,“非知英文”的梁启超曾赖其徒罗昌口述曾译二章,自己省母时“间取裴伦诗读之,随笔逐译”^①。由此推测,《哀希腊》以英文本为底本。在瑞士,他利用闲暇时间翻译德国席勒的戏曲《威廉退尔》,他在《译言》中说,不能把此曲仅仅做戏曲读,“实可作瑞士开国史读”^②。德语是瑞士的四种国语之一,是大多数国民的母语,马君武汉译时可能以德文本为底本。马君武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绿城歌客》,在《译言》中说:“此书虽记绿城一夕之事,而要为主张人道最力之书。”^③寥寥数语,要言不烦,画龙点睛。但不知他汉译时所据底本。关于马君武翻译的《心狱》,有人说:“1907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君武从德文转译的《心狱》(《复活》节译)”^④今从其“从德文转译”之说,“1907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则不敢苟同。王庆通精通法语,兼及英语,但其文学素养没有达到独自翻译小说的程度。他与林纾合译的作品有九部收入《说部丛书》中,包括法国大仲马的《蟹莲郡主传》、法国爽梭阿过伯的《溷中花》、法国辟厄略坻的《鱼海泪波》、法国小仲马的《香钩情眼》、《鸚鵡缘》与《香钩情眼》、比利时恩海贡斯翁士的《孝友镜》、法国丹米安、俄国华伊尔合著的《金台春梦录》以及英国卡叩登的《莲心藕缕缘》,其中大部分是法国小说,《金台春梦录》的翻译可能是以法文本为底本。

《昙花梦》是一本未署原著者和译者的汉译本,颇值得玩味。这部译作如下:

① 《马君武诗稿》,出版社不详,1914年6月版,第20页。

② 马君武:《译言》,《威廉退尔》,《大中华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第1页。

③ 马君武:《译言》,《绿城歌客》,《大中华杂志》1915年第1卷第7期,第1页。

④ 高荣国:《晚清民初时期托尔斯泰作品的译介路径、原因及其误读》,《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20页。